

戴耀廷販賣「末日論」炒完法治炒宗教

深度
評論
大衛

被港大辭退後的戴耀廷，亂港行動並沒有停止，日前更提出一個所謂的「拉撒路計劃」，聲稱「香港已死」，鼓吹召集四千「信徒」，為「重生後的香港」努力。這些主張和言論，充滿了荒謬與鼓吹「末日論」的「邪教」意味。一個自稱「法治教育工作者」以及一名基督教徒，戴耀廷炒完「法治」之後，又喪心病狂到要以宗教作為亂港工具。六年前他發起的非法「佔中」及至去年煽動的黑色暴亂，葬送了多少年輕人，如今還要繼續將年輕人引向死路，用心何其惡毒。

戴耀廷日前撰文，公布其所謂的「拉撒路計劃」，並解釋稱，是借用《聖經新約》中的拉撒路死後在墳墓中過了4天、耶穌基督終來到使他復活的故事。借此為喻，推動這繪畫香港未來的「民間商討程序」。表面上看，這似乎只是個自我炒作以求吸引公眾關注的手段，類似於當年的「佔中商討日」。但仔細推敲，可以發現當中包含了極其危險的因素。

煽動港人要有「已死的覺悟」

最為嚴重之處在於，當中存在顯而易見的「末世論」。例如，戴耀廷在文中稱，「我們已進入一個暗黑無光的墳墓裏，唯有對死亡有所覺悟，才會想方設法脫出專制政權以謊言、金錢及強權所建構起的巨大牢籠」、「到了這刻，港人必須有香港已死的覺悟……缺乏死亡的覺悟，我們是難以正方面對死亡的。」這些言論，與世上曾經出現過的鼓吹末日論的邪教主

張何其相似？

什麼叫「缺乏死亡的覺悟，是難以正方面對死亡的」？戴耀廷顯然是在進行一場針對支持者的新洗腦宣傳。通過渲染「末日」的恐懼，通過散播「香港已死」的絕望，去達到兩個目的。

一是重新集結去年黑暴的極端支持者。儘管攬炒派通過「修例風波」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破壞力量，但隨著香港國安法的出台，以及警方的全力執法，暴徒逃的逃躲的躲、坐牢的坐牢，關鍵的是，「攬炒」心理受到重創，這股黑色破壞力已經被打散，其要通過暴力行動去奪權的三部曲已正式宣告破產。因此，戴耀廷及其幕後的外國勢力，需要以一種新的政治主張、新的道德感召力，去重新集結這股黑色力量。而再叫賣「法治」、「違法達義」，已經沒有任何叫座力，唯有宗教才是他們最後的煽動媒介。

二是整合目前四分五裂的攬炒派政客。黎智英因涉嫌觸犯國安法被捕，目前已由台上轉為台下，無法再像過去一樣公開指揮協調。這也說明了為什麼在立法會去留問題上，亂港政客陷入巨大的內鬥當中。戴耀廷正是要透過鼓吹充滿宗教意義的「拉撒路計劃」，以獲得類似於區塊鏈的「去中心化」攬炒派協調與指揮機制。表面上該計劃沒有「核心」和「大台」，由所謂的四千「信徒」去商討，但實質上討論什麼、如何形成共識，有大量的手段可以操控。一旦「拉撒路計劃」運作有效，則可以借助正在籌備的「民間議會」，去達到架空香港的立法機關，甚至架空攬炒派立法會議員，由他或他背後的政治力量去操控整個所謂的「民

間民主運動力量」。

在戴耀廷的筆下，自己似乎就成了「救世者」，在他定義了「香港已死」的末日情形之下，他就是那個被上帝選中的「使者」，可以拯救世人，「門徒」通過追隨並克服種種困難，最終可達「天堂」、享受真正的「永生」。所有這一切，是否十分熟悉？沒錯，邪教一方面用政治術語包裝以進行傳教行為，另一方面用宗教語言渲染並達至洗腦信眾。

戴耀廷終須付出慘重代價

多年前，美國曾發生過一宗「天堂之門」事件。一個以聖地牙哥作為主要活動區域的千禧年主義不明飛行物體宗教組織，由馬歇爾·阿普爾懷特和邦尼·尼托斯在1970年代早期創立。在1997年3月26日，39名相信他們能通過集體自殺來進入跟隨在海爾一博普彗星之後的外星飛船的信徒的遺體被警察發現。「天堂之門」和「拉撒路計劃」，又有多少共通點？很多時候，邪教信徒們並不會因為幻想破滅而鳥獸散，反倒越發堅定了信仰。他們承受着普通人的嘲笑，走上街頭，公開宣揚他們的教義，懷着強烈的熱情招攬更多的信徒。「拉撒路計劃」，是在鼓吹末世，是在鼓吹「對死亡的覺悟」，是在鼓吹「自我獻身」，是極其危險的「攬炒計劃」。

但戴耀廷很可能要失望了，「佔中」救不了他，「黑暴」也救不了他，「末日論」更救不了他。香港不僅沒有「死」，反而在懲治黑暴之後，煥發更大的活力。而戴耀廷終將為自己的邪教思維本質，付出慘重的代價。

攬炒派不可避免「泡沫化」收場

議事
論事
陳光南

香港的攬炒派正在面臨泡沫化的風險，是否重返立法會延任一年，民主黨、公民黨、工黨、「人民力量」都陷入了困局。他們本來全力反對特區政府因疫情推遲立法會選舉一年，聲稱押後選舉「缺乏法理依據」「剝奪了港人的選舉權利」「侵犯了香港的人權和自由」云云。

全國人大常委會就立法會「空窗期」問題作出決定，現屆立法會繼續履行職責不少於一年。攬炒派紛紛製造輿論，宣稱「民研」的調查反對他們重返議會，但有關調查未必能夠反映真正的民意。民主黨準備重新進行民調，降低門檻，自製重返議會的理由。

民主黨明顯是違反攬炒派兩大原則：第一是尊重違法「初選」結果；第二是「齊上齊落」原則。在「初選」輸了的「傳統泛民」政客，仍想厚着臉皮重返議會，破壞自己的諾言。看來「傳統泛民」已經放棄了「齊上齊落」的原則，和「激進派」分道揚鑣。

「傳統泛民」提出了國際路線，主張爭取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的支持，繼續反對香港國安法，繼續奪權鬥爭；但是他們又胡謔「『一國兩制』已死」，要另行找尋出路。結果，他們走進了死胡同，如果繼續在「一國兩制」、基本法框架下產生的立法會履職，就有違所謂的「道德和良知」，陷入了道德破產的困境。現在民主黨面對「民研」民

調，多數受訪者認為攬炒派議員應該「總辭」，即使再舉行一次民意調查，降低門檻，結果恐怕亦不會逆轉，屆時民主黨怎樣找尋藉口狡賴，只會暴露他們的自相矛盾。

「激進派」已經展開全面攻勢，對民主黨大舉攻擊。「激進派」區議員已展開「拆大台」行動，提出在區議會成立所謂的「香港公民議政平台」，準備18區各派代表成立「籌備委員會」商討平台細節。「激進派」仰仗着在區議會佔多數的優勢，「平台」是要以他們為主導，領導和掌握立法會的所有資源和動向。包括議員的薪金和助理人員的調配和聘請。這種局面，如果延續到明年的立法會選舉，他們就可以大舉出擊，取代「傳統泛民」的位置。

仰仗美國注定失敗

問題在於，香港國安法實施後，「傳統泛民」的生存空間究竟有多大？他們所依賴的外國勢力支持究竟是否可靠？會否流失大量激進派票源？情況相當悲觀。

美國的疫情全世界最嚴重，死亡個案最多。現在的情況是，全世界很多國家都對來自美國入境者實施限制。美國國務院日前更新對中國內地及香港特區的旅遊警示級別，建議國民「重新考慮」前往旅遊。美國的「大發慈悲」簡直是國際笑話，美國航空業因

為疫情而奄奄一息，美國政府必須繼續補貼航空業的嚴重虧損，出於現實的考慮，亞洲地區疫情普遍受挫，旅遊業有可能復甦，如果美國航空公司能夠有客源前往位於亞洲中心位置的中國和香港，航空業就會出現一線生機。

至於經濟「制裁」香港，美國一直雷聲大雨點小，為什麼？香港是美元的三大交易市場之一，不允許香港進行美元交易，香港已經準備好數碼銀行和數碼貨幣交易，香港聯繫着東南亞地區的國際貿易結算，將會改為以人民幣作為單位進行結算。美國以美元交易制裁香港，實際上是制裁自己，並且為人民幣成為國際貿易貨幣創造黃金機會。

美國在高科技領域制裁中國的互聯網和電子企業，封鎖中國的5G技術、應用程式，截斷中國的電腦芯片和電子零件的供應，不准中國使用美國軟件的知識產權。結果是美國發現，自己大大低估了中國的自力更生的能力。原來中國已做好了有朝一日美國會採用「脫鉤」的準備措施，中國開始使用自己研發的系統，不再依賴美國的電腦操作軟件，開發替代美國安卓的系統，也不使用美國搜尋引擎，更不使用美國的衛星定位系統。美國人失去了中國這個十四億人口的市場。因此，美國藉香港國安法干預香港事務的能力有限，在這種情況下攬炒派如不改轍易轍，只會落得泡沫化收場。資深評論員

雙管齊下推進香港的協商民主



議論風生
李山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收錄了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中央政協工作會議暨慶祝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7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回顧了人民政協在建立新中國和社會主義革命、建設、改革各個歷史時期的重要貢獻，特別強調人民政協是世界民主政治理論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偉大成果，是我國新型政黨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習主席的重要講話高屋建瓴、內涵豐富，對香港特區政府提高管治能力、豐富「一國兩制」實踐具有理論意義和指導意義。

以人民政協制度為標誌的協商民主制度，堅持一黨領導，多黨合作，服務於體現絕大多數國民利益的社會公義，堅持了人民主體地位。它源自中華民族長期形成的天下為公、求同存異的政治文化傳統，能夠有效克服西方黨派和特殊利益集團為了私利損害人民根本利益、長遠利益的弊端，是中國各黨派、各團體、各民族、各階層、各界人士在政治制度上共同實現的偉大創造。協商民主不僅在中國有根、有源、有生命力，也對西方民主制度未來的發展具有啟發性意義。

平衡社會各群體利益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美衝突存在長期化跡象，香港成為中美的角力場。在「一國兩制」框架下，香港繼承和沿襲了港英時期的政治制度。在互聯網時代，由英國人制定的選舉制度已經不合時宜，它消耗了香港大量資源，阻礙社會進步，成為妨礙經濟和民生發展的沉重枷鎖。非法「佔中」、「修例風波」等事件彰顯了香港的政制局限和創新不足，其直接表現是我們無法把香港各界智慧和力量凝聚起來，形成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的強大合力。

香港未來政治制度可以借鑒內地的協商民主，通過制度性協商，平衡對立的社會群體利益，遏制極端勢力，防止民粹主義蔓延，也防止特殊利益集團掠奪大多數市民利益。

建議以雙管齊下的方式循序漸進地達成目標。一方面，可以考慮設立香港政治諮詢委員會，委員由社會各界協商產生，並由特區政府委任，從而在香港引入和建設協商民主機制，更好地維護和增進全體香港市民的長遠和根本利益；另一方面，可以考慮適時改革立法會，完善功能界別選舉辦法，展現人民民主精神，同時進一步區隔功能界別議員和直選議員，兩組議員並立、分別議事、互相牽制，從而加強立法會內部協商與制衡機制。

這種安排既有利於維護和發展現有的選舉民主制度，也能夠避免部分議員濫用權力，阻礙經濟民生發展，從而切實增進市民利益，同時捍衛社會公義，緩解行政權與立法權之間的衝突，有利於提升香港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促進社會和諧穩定與發展。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香港絲路金融公司首席執行官

釋放土地 增建房屋

有話
要說
馮宣

本港土地及房屋供應持續緊張，多個建制派團體先後建議廣東省政府在大嶼山以南的珠海桂山島填海造地，再租借予香港發展，屆時特區可以將葵涌貨櫃碼頭搬到島上，以釋放更多土地以供發展。這建議可謂突破過往思維，若能成功落實，不但有助解決香港房屋土地問題，更可趁此契機，在大灣區興建世界級港口，提升競爭力。

中國經濟發展一日千里，去年全年國內生產總值（GDP）為990865億人民幣，經濟總量排名世界第二。同年，中國全年貨物進出口總額為315446億人民幣，進出口總額比對2018年俱有增長。這些經濟成果，亦有賴港口及海運業支撐。

按港口貨物吞吐量計算，目前廣東坐擁廣州、湛江、深圳、珠海、東莞、中山、惠州七個億噸大港，其中六個在大灣區，再加上香港，大灣區共有七個億噸大港，這些港口航運為大灣區經濟及社會發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不過，這些港口部分設施已呈落後並各自為政相互競爭，應是時候考慮整合大灣區內各大港口，共同建立一個世界級港口，可有效利用各碼頭，加強融合共同發展，產生協同效應，繼而提升大灣區港口整體的國際航運競爭力。

搬遷貨櫃碼頭至桂山島

透過港口整合，位於市中心、佔據了大面積價值極高土地資源的葵涌貨櫃碼頭，以及深圳鹽田國際集裝箱碼頭可搬遷至非市中心位置，空出的珍貴土地可作房屋、工商業等用途，除可解決住屋問題之外，同時有助該區經濟進一步發展。新加坡同樣面對土地短缺的挑戰，總理李顯龍早前提出的未來發展藍圖，其中一個重點，便是將新加坡南段的丹戎巴葛、吉寶、布拉尼、巴西班讓碼頭，搬到位於新加坡西邊的大士港，以騰出市中心珍貴土地作其他發展。

至於將葵涌貨櫃碼頭搬往桂山島的建議，絕對值得深入研究。桂山島有地利優勢，位處深圳、香港、珠海及澳門中央，除可利用駁船將貨物轉運至不同城市，也可以在桂山島建設引橋接駁港珠澳大橋、經大橋將貨物運往粵港澳各地。前中央政策組首席研究主任王春新及全國政協委員凌友詩早於2018年提出桂山島填海借地倡議。王春新早前接受媒體訪問時亦認同，桂山島有地利之便，可以將其中15平方公里用地作港口物流業，把香港、深圳、廣州等地的貨櫃碼頭搬進去，並可參考上海洋山港的做法，粵港澳合作建設現代化的貨櫃碼頭，提升效率。

香港在經濟上與內地融合是不可逆轉的大趨勢。桂山島填海再租借予香港的構思，香港特區政府不應再錯過機會，應積極研究及着力推動。

一手管控疫情一手恢復經濟

為期十四天的「普及社區檢測計劃」結束，逾178萬名市民完成採樣，最少找出42名隱形患者，為香港走向復工及正常生活奠定了基礎。

對此，我們需要感謝中央政府的關愛，對香港不離不棄、對香港市民生命健康可護有加；感謝無私援助的近700名內地支援隊成員，不僅承受高強度的工作壓力，更遭受偏見的惡意攻訐；感謝參與檢測工作的香港醫護人員和其他工作人員，他們不畏政治流言，令普檢計劃安全、有序、順暢；同時也要感謝逾178萬積極參與檢測的市民，他們主動履行公民責任，為己為人，為香港遏制病毒在社區爆發，為香港病毒檢測積累經驗，為恢復經濟提供決策數據，也為提升市民抗疫的認識與信心，盡了一分力量。

本次檢測取得抗擊疫情階段性重要成果毋庸置疑，特別是在香港泛政治化、攬炒派大肆攻擊抹黑的情況下，政府和社會各界所做的努力不可低估。但也不可否認，逾178萬個人完成採樣並不足夠。

前日，新增六宗本地感染新冠肺炎確診個案，當中三宗源頭不明，這證實社區內仍有隱形患者，我們不能掉以輕心。隨着普檢計劃結束、內地支援小組離開，以及政府有限度放寬



港事港心
葉建明

限制措施，接下來香港抗疫之路如何走，關係到香港經濟能否復甦，市民能否在一個安全健康的環境工作生活。正如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所說，在與新冠病毒共存的新常態下，防疫措施和準備需要常態化，但卻不能容許讓疫情爆發也呈常態化。

首先需要做到抗疫復工兩不誤，把握兩者平衡。面對疫情漸趨穩定，一邊嚴陣以待管控疫情，一邊密鑼緊鼓恢復經濟，刻不容緩。這也是全球各地當下共同面對的迫切要務。香港零售、餐飲酒店等行業，經歷了黑暴和疫情的雙重打擊，現在大多「只剩一口氣」，再不恢復市道，年底必然有更多企業倒閉、更多人失業。政府的抗疫基金只是暫解飢渴，市道回暖才能令企業重回升機。但復工與抗疫是相輔相成的。國外很多例子顯示，一旦無節制地放寬，把恢復生產凌駕於抗疫之上，其無不是以疫情再度反彈為代價。

因此，市民要避免「抗疫疲勞」而放縱自己，戴口罩、社交距離依然需要成為生活中的「標配」。從只有逾178萬人參與普檢看，市

民的社會公德心並不足夠。如果沒有同舟共濟、共渡時艱的心理準備，做不到人人為我、我為人人，既無法保住抗疫成果，也無法恢復經濟，香港前景堪憂。

為此，特區政府需要考慮在疫情僵持階段力爭檢測「恆常化」，主動查找感染源依然是當前阻擊疫情發展最有效的科學手段。普檢計劃另一項成果是特區政府積累了經驗，與內地和香港檢測團隊磨合順暢，有助提升本地檢測能力。

另外，政府需要敦促高風險群體如安老院舍職工、超市、餐飲業職工等根據需要適時檢測，不可以為接受一次普檢就一勞永逸，避免再次出現群組感染。

「普及社區檢測計劃」完成後，特區政府還需要盡快推出「健康碼」，放寬與內地以及其他疫情受控地方人員往返限制，這是社會迫切的呼聲。

面對黃之鋒之流的亂港分子反完普檢計劃，又將矛頭指向「健康碼」，揚言「健康碼」將會是「下一個戰場」。特區政府應作出充分準備，適時向社會講解「健康碼」背後的技術、私隱等問題，有力駁斥攬炒派、亂港分子的種種謠言和抹黑。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經濟社會理事會理事